

毛澤東

早年讀書生活

李銳●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李锐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沈阳

以暴制暴，别动队等已由中由局，编队本队，彭德怀等部是  
五部平津局编队等部公策，参

参 引

日 02 月 7 年 1991

##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Mao zedong Zaonian Dushu Shenghuo

李锐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frac{7}{8}$  插页：4

印数：1—1,29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英 健  
封面设计：王申生  
杨 勇

责任校对：刘 涛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2064-6 /A·12

登记号：(辽)第1号 定价：10.75元

##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代序)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在这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腐败的清王朝无力抗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迅速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坚忍不拔、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取得的。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可以说，他的一生曾影响和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出生和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列宁也说：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所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响应历史的召唤，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的呢？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为此作过一些怎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又给他后来的事业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篇短文只准备介绍他学生时代若干有关的资料。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当年这里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他的父亲识字不多，但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

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诉讼中的失败，使他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sup>①</sup>毛泽东8岁被送进私塾，一直读到16岁，中间曾停学二年，经过同父亲力争，才又读了一年。六年私塾，读《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读得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sup>②</sup>事实上，当时的学习远不是只起了识字的作用，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枯燥难懂的书本，读熟了，就有些近似于电脑的软件储存，以后用起来是现成的。毛泽东幼年时代的记忆，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我们看五卷《毛泽东选集》，其中许多孔孟之言常用得恰到好处。

那时，毛泽东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者小长工兼学生。13岁到15岁这两年，整天在地里干一个全劳力的活，夜晚还要帮助父亲记帐。尽管这样，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任何书籍。对《三国》、《水浒》等等小说尤其喜爱，熟记其中的一些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阅读中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加上《左传》中那些战争的记载，这对于毛泽东

<sup>①</sup> 见斯诺《西行漫记》。本文所用毛泽东自己回忆材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18页。

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例如《水浒传》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教条主义者，曾经这样挖苦过他：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等等，来指挥战争。

也正是在这努力搜求书籍的时候，毛读到了《盛世危言》一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作者郑观应是清末的一个改良主义者，从他自己取的一个别号“杞忧生”可以看出他的忧国之心。他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主张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例如，实行保护关税，发展机器制造业，以商战对商战，并设置议院等等。这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前，鼓吹维新改革最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甚至30年之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书的大要。对书籍的广泛兴趣，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来的特色。

在家里，毛泽东不满于父亲的专制，他从不愿受约束，好自行其是，有过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用他后来风趣的说法，“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热爱母亲。母亲是一个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帮助别人的农村妇女，她的品德给了儿子良好的影响。她对神佛的信仰很虔诚，经常向儿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少年毛泽东也信过神佛。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就曾经提到“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的事。我们知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15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第二年，1909年，一个新

派教师李漱清回到韶山，向人们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宗教迷信。毛泽东同他很谈得来，在他的影响下，又读了上述《盛世危言》等新书，终于破除了对神佛的迷信。1925年，李漱清也到了广州，他们曾一起工作。

毛泽东在家里一面种田，一面自己找书来读，在私塾又读了一年之后，他16岁了。父亲决定送儿子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做学徒，以培养经商的本领，好继承家业。这时他听说邻县湘乡的东山书院改成了一所新式的高级小学，由于求知的渴望，坚决要求到东山小学去读书。父亲拗他不过，终于让步了。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也就离开了这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帮助这个少年作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第一个重大抉择。

在这所新式小学，毛泽东除了仍读经书之外，第一次受到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英语。在这里，由于他领悟力、模仿力高，古文写得好，教员都看重他，国文教员尤其喜欢他。他写的好些篇文章在校内传诵一时，以至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得其中的一些题目：《言志》、《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等。校长和教师都很器重这个学生，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在东山小学的同学中，毛泽东也有几个家境相近的友伴，如后来以诗人闻名的萧三（当时名萧植蕃）就是一个。萧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借一本《世界英杰传》给毛泽东，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书还来的时候，毛泽东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整本书上加上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8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独立。他说：中国也要

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且十分崇拜这两个人物。他借到了一套《新民丛报》。这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刊物，1907年就停刊了。康、梁作为两颗明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898年，那时他们代表着维新改革的历史要求，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待到毛泽东从旧刊物上接触到梁启超的时候，明星的光芒早已暗淡下去了。但梁启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仍使他觉得无比的新鲜。由于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对这些新学的理解和接受显然要比几年前读到的《盛世危言》更多。特别是梁启超的那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章，更使他神往。他有意模仿这种笔调，也很能写一点这种文体的政论了。这时他还取别名“子任”，可见对梁仰慕的程度（梁启超号任公）。1918年，他和蔡和森、何叔衡、萧三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民学会；从学会命名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影响的印记，因为梁在《新民丛报》发表过一篇很长的系列文章《新民说》，曾轰动一时，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这个学校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想到长沙去，他听说，那里有很多更高级的新学校。正好这时候学校的国文教师贺凤岗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他愿意带这个学生到长沙去读书。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长沙，进了湘乡驻省中学堂。来到长沙，对于毛泽东后来的道路，是一个更大的转折点。长沙是湖南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晚清几十年中新旧斗争的激烈场所。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



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黄兴、陈天华等许多人，都先后在这里活动过。只是来到长沙之后，毛泽东才更直接地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这时，清王朝已经临近了自己的末日，它的腐败统治导致列强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在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一年以前，长沙城里曾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旗杆上悬挂着示众的人头。事件发生的当时他还在韶山家中，那许多天里，他都和友伴讨论这事，为饥民深感不平。后来他对斯诺说，这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正在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许多地方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就在毛泽东来到长沙前夕，广州爆发了进攻督署的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这一震动全国的可歌可泣的壮举，也给了毛本人很大的影响。8年之后，他在自己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sup>①</sup>毛泽东，就正是一个“跃跃欲试”的“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了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运动。他和几个激进的同学不但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还“出其不意强剪”别人的辫子。有无辫子，是清王朝用来区别顺逆的标志。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sup>②</sup>湖南地方当局“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sup>③</sup>他说，他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

①②③ 见《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出版）所载《本会总记》一文。

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sup>①</sup>

清王朝不但应该推翻而且将要被推翻，这一点在毛泽东已经是完全清楚的了。尽管带着一种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幼稚认识，他还是在很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 and 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正如他自己说的，他这第一次发表的政见，竟没有能弄清楚当时革命派同改良派政治上的分野。但他这“有些糊涂”之中仍有不糊涂之处，在他所属意的三驾马车中，辕马毕竟是孙中山而不是康、梁。

1911年10月10日（夏历8月19日）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也改变了毛泽东发展的道路，使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只读了半年左右就中断了。当时，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独立的省份，10月22日，成立了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只有10天，立宪党人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兵变，伏兵杀害了焦、陈二督，自己接任都督。一个月里政治风云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毛泽东在长沙，目击了这一切。焦、陈举义之前，他曾经准备响应湖北军政府的号召，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听说武汉街道潮湿，还特地找朋友借得了一双雨鞋。湖南宣布独立以后，不必去武昌了，可以就近在长沙参加革命。

<sup>①</sup> 见《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出版）所载《本会总记》一文。

他不愿意参加当时正在组织起来的学生军，就在这年10月底，他到长沙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团）第一营左队里当上了一名列兵。那时清朝皇帝还没有宣布退位，他参军，是要为完成革命尽一份力量。后来他这样叙述了当年的兵营生活：“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读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兵营里，同穿着军装的工农分子有了直接的接触，其中有矿工和铁匠。他跟这些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当年的副班长于1950年夏天，给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来信，毛主席亲切地写了回信<sup>①</sup>。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权达成协议后，不久就宣告解散，南北“统一”了。毛以为这一场革命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做了，决心退出军队，回到他的书本上去，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学校，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实业学堂等等，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1912年春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立第一中学。但他对这个学校也不满意，以为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从一位很器重他的国文教师那里借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读得很有兴味，觉得与其上学，还不如自学更好，可以多读自己喜爱的书。他在这个学校里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被保存了下来，

① 副班长名彭友胜。这封回信曾由笔者装裱珍藏，1960年连同其他收藏的手迹上交中央办公厅。

让后人得以了解他当年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能力。这样，他在该校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毛泽东在这里全身心投入书籍的海洋，也在这里起步“走向世界”。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輿大地图》，每天经过，总要停下来细看一阵，感到世界真大！中国古称“居四海之内”，把自己和整个世界等同起来，其实从地图上看，它只占地球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简直找不到地名。他想，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真是太值得研究了。在图书馆，他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由于误译或误记，这里的书名有的是不准确的。如《物种起源》，可能即是当年风行全国的严译赫胥黎著《天演论》。严复翻译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等书，都是18、19世纪欧洲社会学方面的名著，待到严复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有些过时了。这时，在西欧先进国家，马克思主义早已出现并且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亚当·斯密等人的学说已经显得很暗淡。但是，这些较之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经典来说，依然还是进步的东西，这是不论《论语》、《孟子》直到《御批通鉴辑览》中，都完全没有的全新的道理。因

此，这些书多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影响。毛泽东从严复译述的这些书中受到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启蒙教育。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法”，毛以为不只是社会学，对各个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读过之后，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这本书：“为学之道在是矣！”“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还有那著名的《天演论》，这是严复根据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编译而成的，其中夹有许多译者的评论。如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反对中国人“好古而忽今”的思想；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康有为鼓吹维新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是以对儒家经典作出新的阐发来反对“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的。跟康梁不同，严复原原本本地介绍西方的名著，着重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使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学术，给维新派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严复的这些译本给了青年毛泽东很大的影响。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被并列于“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这半年的自修是很惬意也极有收获的，但因遭到父亲的反对而无法继续下去了，父亲希望儿子能进正规的学校念书。为了能继续从家庭取得有限的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又得到学习的机会，他最后不得不考入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1913年春季，将近20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他又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他在这所当年很有名气的学校学习了五年半。

毛泽东利用在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时间，专攻社会科学，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的思想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他回忆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低。”“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这是一件很能够显示性格特征的轶事。他是一个从来不愿受约束而要按自己主见行事的人。对于当时像他这样一个立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学社会科学远比自然科学有兴趣是十分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第一师范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当时给他影响最深的是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杨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共达10年之久，自幼服膺程朱之学，青年时期即具有爱国思想（留学时改名怀中）。与当年一般竞学法政、实业、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国潜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闿想延揽他做教育司长。他不愿做官，只是选择了一个冷清清的位置，当一个师范教员。很显然，这是由于他不满足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毛泽东认为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难得的是，在众多学生中，杨昌济对毛泽东也最为欣赏。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

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sup>①</sup>据杨昌济好友章士钊回忆，一九二〇年曾接到杨去世前的信，称述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sup>②</sup>

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给予学生以良好影响的，还有徐特立和方维夏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同学中的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瓚、张昆弟等，也都是关心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绕在杨昌济老师的周围。后来他们和毛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建党以后，他们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党员骨干，并且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这些师友都和毛有着很深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着良好的影响。

毛泽东还希望结识本校同学之外的有志青年。1915年11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这里指的就是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这启事的内容，据他后来对斯诺说的，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应征的五六个人中，有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李立三和罗章龙。

<sup>①</sup>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sup>②</sup> 见《杨昌济文集》附录。

罗，在复信中写道：“空谷足音，趫然色喜。”他们结识以后来往颇为密切，经常交谈读书心得，交换读书笔记。后来新民学会成立，罗章龙是最早的会员之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好学深思的情况，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写的一本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当年的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讲稿，就工工整整抄了七大本），曾积有一大网篮，存放在韶山家中。马日事变后，有族人畏祸，将这些搬到后山烧毁。他幼年的塾师将这一本笔记保存下来。

笔记本共 47 页，1 万余字。前面 11 页是手抄《离骚》和《九歌》全文，可见他对楚辞爱好之深。后面 36 页冠以《讲堂录》之名，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科的笔记，当是 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听杨昌济讲修身课和上国文课时所记。其内容颇为驳杂，有文字训诂、警句摘录、古人的里籍年代，间或稍加评鹭，有几处也记及圆周率、经纬度等自然科学常识。笔记中偶有发议论处，现在很难分辨这些究竟是学生本人的意见还是教师的意见。但至少可以认为，这些经过选择而记下的意见大抵是学生所赞同的。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这个青年学生读书之博，用力之勤，由此还可以窥见当年他所受的影响。

《讲堂录》中，孔孟儒家学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跟老庄的主要是出世的思想不同，孔孟主要是入世的思想。显然，毛泽东正是怀有改造国家社会的抱负，才对孔孟学说发生兴趣的。例如，他摘录了孟子说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的话；提到了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提到了自许“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等等。可贵的是，青年毛泽东并没有全



盘接受孔孟的思想，而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例如，他写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按：见《论语·卫灵公》），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谋夫食也。‘志不在温饱’（按：宋代王曾的名言：“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列宁在《哲学笔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认为，费尔巴哈提出的道德不是别的，只是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论点，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毛泽东的这些议论显然也是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的。

《讲堂录》中还记有曾国藩的语录：“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记下了曾撰《圣哲画像记》中所标举的32个人；以及曾所倡导的“八本”：即读书、作文、养生、事亲、居家、立身、做官、行军等项的基本准则。他对曾国藩的赞赏显然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这里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旧时尤其是湖南的读书人，包括一些有为之士，一般容易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治学、办事、处世、为人的影响。曾国藩一生究心宋明理学，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声称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的道统，因而笼络了一批汉族封建知识分子。对于曾国藩鼓吹程朱之学，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杨昌济很是推崇，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认为曾国藩抓住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